

文化翻譯與情感態度

孫藝風

[提 要] 翻譯態度因不同文化傳統而異，有關翻譯的運作流程，不同文化有著不同的基本假定，其廣泛和持續的影響，不容忽視。翻譯中立是一種帶烏托邦性質的預設，掩蓋和遮蔽了政治爭拗與文化衝突。複雜的情感、態度、情緒和性格，常與目標語的文化政治和美學規範糾纏不清，故此有意或無意地違背翻譯中立的行為，並不足為奇。同時，也不難看出一味追求或固守中立的負面影響：可能引致漠不關心或冷漠超然的情況。譯者干預是翻譯態度所折射出的文化差異使然，雖較容易被政治化，但為了完成跨文化交際的任務，卻又是不可或缺的。干預決定了文化挪用的性質及方式，與是否有情感的投入以及何種程度的投入，有著直接的關係。就翻譯的對象而言，除了基本資訊外，原語裡的感情或情感也需要傳遞，並在譯作裡得到較為清晰和充分的體現，使目標語讀者有參與跨文化體驗的機會。由翻譯而生的位移可能造成異位，乃至錯位，故此，翻譯在調整的過程中需要考慮移情。本文擬提出一個探索翻譯態度的方式，進而分析細緻入微的感情或情感的傳遞（達），考察其對譯作的產生和形成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翻譯態度和干預方式及其程度，體現和彰顯了譯者的主體性，並揭示出不同譯作所循的差異性途徑。

[關鍵詞] 文化態度 感情與意義 情感反應 互文典故

[中圖分類號] H0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3) 02 - 0183 - 08

在世界經濟、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人們愈來愈清楚地認識到，翻譯離不開譯者的調解，乃至干預，文學翻譯更是如此。相對而言，干預是更為強勢的調解形式，表現性質更顯決斷，效果更顯連貫，主要作用是使翻譯活動不至於失控或走偏，以至於產生不期然或不想要的效果。翻譯態度，無論是個體的還是群體的，在相當大的程度決定著翻譯的操作模式，對於譯作的接受，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它勢必喚起讀者的某種情感反應，從而影響到譯本的接受。翻譯涉及到異質文化的方方面面，由此而生的對他者的害怕心理並不鮮見，主要表徵為懷疑和擔憂。考慮到目標語讀者所持的文化或政治態度，出於協調和妥協的必要，譯者可能採取相應的翻譯策略，有時甚至到了改動原文內容的地步。可以說，準確把握對譯作的態度能夠揭示出翻譯的操控程度。與此相關的感情話題也涉及到閱讀譯作的體驗。翻譯行為伴隨著感情和情感的喚起，相互參照並互為

融入。一般而言，感情是個人的事，帶相當的主觀性，文學閱讀的體驗也莫不如此，而這些體驗與他人的想法和感情又產生了聯繫。翻譯通過提供跨語言和跨文化的體驗，包含了各種感情和情感的各個層面，給閱讀增添了豐富的感受。有鑑於此，充分體現感情有助於讓譯作煥發活力。無論閱讀原語文本，抑或是譯語文本，情感反應是至關重要的。為使目標語讀者能夠在跨文化意義上做到情感投入，譯文的可讀性不容小覬。故此，建立聯接切實可行的表現感情與情感互文典故，顯然十分必要，從而體現翻譯應有的深度和複雜性。

翻譯態度

把翻譯視為中立、隱形而又不動聲色的行為，無疑過於理想化。與之相反的事實是，為了達到某種效果，譯者有時採取直接的干預方式。以口譯為例，如果譯員對翻譯對象缺乏尊重，超然事外的專業表像也難以掩飾住某種不屑或不敬，典型的做法是，大肆刪（篡）改，或極度簡化所講內容。當然，按照口譯的職業要求，這似乎不足取，也是不允許的，但其實是以不同形式和在不同程度上不斷發生的事。毫無疑問，筆譯也存在類似的情況。Robert Wechsler 指出：“譯者對作者的態度極大地影響他的翻譯方式，也會控制他的闡釋決定”。^①無論譯者對原作厭惡還是著迷，他的情緒難免不在譯作裡表現出來。對原作及作者的態度隱藏在各種干預策略裡，並在翻譯過程中以諸多方式顯現。

譯者是否嘗試做到中立本身已是個態度問題。無可否認的是，以嚴格意義上的中立精神來從事翻譯，只是可望不可及的虛幻。然而，人們對譯者仍有這方面的期待：而某種程度的中立客觀還是必不可少的，譯文或多或少要顯示出最基本的可靠性，以滿足一般人對譯作的期待和要求。當然，嚴格地說，這並非易事，因為任何交際行為都有調解相伴，同時還涉及到人和事的感情、情緒、性格和態度等因素。此外，譯者的所謂中立的可能性，出於一系列的考量，包括社會、政治、文化，尤其是主觀方面的，更突出其爭議性，因此有必要重新審視對翻譯中立的理想化追求。Sherry Simon 在論及性別與語言時刻意指出：“對語言使用的性別方面保持敏感，需要懂得任何重寫行為所表達的主體性。翻譯絕無可能是重複性的中立行為：調解包含的既有轉化也有位移”。^②鑑於調解是翻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時位移在本質上也排除了簡單重複的可能性，譯者的主體性無時不在地貫穿於跨文化交際裡。如前所述，跨文化交流的中立是難以企及的：源於不為人知的感情緣故，中立終歸不易成立。然而，不容否認的是，個人偏見並非絕對不可控，就整體態度而言，倘若翻譯背後沒有明顯牽涉到政治傾向或美學偏向，相對而言，一定程度的中立仍是可望達到的。

進而還可以認為，除非充分考慮到譯者的移情因素——這使得理解和闡釋的問題變得尤為突出——一味談論中立是沒有實際意義的。但帶有想像力的移情可以起到好的作用嗎？Sharma 以下的觀點值得考慮：

……藝術不可能像攝影作品那樣客觀或超然。藝術心理和科學不同，是帶有偏見的，因藝術是事實和想法的情感化身。藝術家的偏見不僅體現在創作活動主題的選擇，還體現在與之相伴的細節之中。^③

其實，即使是看似逼真的攝影也要受制於攝影師的主體性，由攝影師捕捉鏡頭內可見的內容，並決定聚焦的目標以及淡出的細節。譯者在某種程度上與攝影師無異，也受偏見和主觀局限的影響。翻譯中丟失與添加的東西包括作者和譯者細微的感情，由此構成了目標語讀者的閱讀體

驗。

值得注意的是，所謂固有的文化偏見亦可是個人偏見，二者皆容易扭曲原文的現實複製，造成文化誤讀，既可產生無理的怨恨或錯位的欽佩，又能引發合理的異議或無端的恐懼，閱讀文學翻譯時尤為如此，其結果必定造成文化錯位。移情的缺失大都由文化無知所致，較易誘發文化偏見。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追求與異質他者的某種身份等同是必要的，除了有助於弄清基於或根植於文化差異的文化他者外，還有助於培育恰當的有關他者的文化態度和感情，更有助於向目標語讀者灌輸具有寬容和移情性質的世界主義。不難看出，跨文化交際導致深植於關注他者感受的移情。正如 Rita Kothari 所言，“庶民文學的翻譯支持了庶民鬥爭，尤其是注入了移情和理解的翻譯”。^④一般來說，人們總能夠讓自己的想法和感情去適應文化他者，分享溫暖與親密，同時表現出對於歸屬的強烈需求，意在體驗他人的感情，雖然可能較為不熟悉，最終將提高移情和理解的程度，達到與原文產生共鳴的效果。

在這方面，譯者的真摯是必不可少和至關重要的，主要體現在對異質他者的尊重，這可說是譯作成功的關鍵所在。但真摯並非是翻譯的自動表徵，因為譯者完全可能厭惡或不相信所譯的內容。但另一方面，如果沒有由閱讀原文和譯文而生的不同文化感情的互動，跨文化交流的情感體驗便會遭遇闡釋層面上的困難。但在某些情況下，真摯的缺失又是不可避免的，這使得目標語讀者對譯作的情感反應變得相當不確定。但無論如何，真摯給人值得信賴的感覺，也使翻譯的可靠性得以凸顯，同時也被視作對文化差異和異質他者的尊重。

譯者對原語文本的選擇已清楚地表明瞭其態度，除非翻譯任務是強加給譯者的。但無論何種情況，翻譯態度某種程度和方式的流（表）露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任何意義生產或再生產都離不開文本闡釋。在不可譯的情況下，逐字直譯是行不通的，闡釋則成了繞開困難的唯一辦法。Christopher Butler 認為：“對一個文本的闡釋一般超越它似乎所說的內容”。^⑤於是就產生了額外的空間，需要譯者的聲音去填補。原作表面形式的直接傳送意味著在譯文裡保留或重塑原作的風格，這個風格帶有原作者的態度。但風格卻又可能是不可傳送的，因而必然出現跨文化意義上的改動，結果導致在譯作裡態度的改變，即使是不經意的，也不免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譯者和作者由於態度相異，可能在所涉文本的某些方面產生衝突，因為一般目標語讀者看到的只是譯文，所以譯者的態度——如果迥異於作者的話——是起決定性作用的。此外，目標語的文化語境對相類似的其他譯作當下態度的影響，也是一個相關的考量。一個自然的趨勢是新的情況催生態度的變化，所反應的是相關歷史、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變化，就個體而言，還可能有心理和情緒的變化。再者，譯文的接受取決於目標語讀者對異質文化的盛行態度。一個開放的接受態度對文化借鑒的成功有決定性的影響，同時也有助於消除由異質價值而引發的擔憂。在這方面，歷史和文化語境的變化對翻譯的影響也是需要考慮的。

體驗感情

一般而言，感情難以從經歷中剝離開來。雖然移情和同情在跨文化的條件下可能得以實現，但卻不太容易想像出文化他者所產生的具體影響，因為畢竟原語和目標語各自不同的互文參照，意味著原文和目標語文本分別喚起的感受是不同的，至少是不盡相同的。常見的是，如果文字和文化方面的溝通問題沒有得到妥善解決，目標語讀者容易產生疏離感。文化價值的衝突必然導致目標語讀者在閱讀譯文時產生矛盾心理，深究緣由，是這些譯作代表了不同的觀念、信仰、態度，

還有心象，由此產生的隱喻性表述及文化聯繫引發不同的情感反應。從跨文化交際的實際效果出發，對翻譯感情複雜性的高度認知以及更為願意就細節的微小差別進行調整，尤為重要。

毫不奇怪，作為改寫的一種形式，翻譯的（再）生產方式與原作的生產方式自然不同，而且注入的感情也不盡相同，取決於譯者的主體與相關的文學、社會及歷史語境的互動方式。總之，文化翻譯大抵是由譯者和原語文本的情感關係來定義的，原文以何種方式被挪用反應出翻譯態度，這又是影響和決定目標語讀者情感反應的程度和範圍的重要因素。與態度有重要關聯的是翻譯需要轉達的感情。這其實是有關在一個不同的歷史與文化背景下對他者的體驗問題，重建近似的感情和情緒，需要跨文化意義上的想像，使目標語讀者獲取重溫原語讀者的情感體驗。然而，沒有什麼比複製感情更難的了，畢竟“局外人”和“局內人”的感情終究是不一樣的。有鑑於此，譯者的文化或政治身份便突顯了出來，但譯者又實難承受做文化局外人的後果。假定由於譯者的移情和文化理解不充分致使其譯作強差人意，我們可以認定，只專注於翻譯的語義方面，而忽略原語裡微妙的措辭和細微的文化差異，顯然是不足夠的。在許多情況下，感情的產生和啟動是含蓄溫婉的。更說明問題的是，能夠呼喚某些特定的態度、感情和反應的文化意象，在譯文裡似乎難以複製，造成情感反應的疏離。對目標語讀者而言，如上所述，替代的意象以補償原來意象的損失，大抵會產生不太一樣的感情，或喚起不同的情感反應。

事實上，在一個特定的社會和歷史環境下所捕捉的感情和心境，可能折射到譯者內化的主體，譯者對原文的態度極大地影響到翻譯任務的完成。Douglass Robinson 強調：

譯者也是人，有著自己的意見、態度、信仰和感情。譯者常常被要求去翻譯他們厭惡的文本，也許在幾周，或數月，甚至幾年的時間內，能夠壓抑住他們的反感，但終究不能永久地繼續壓抑這些個負面的感情。^⑥

這說明了過度壓抑所產生的後遺症，但似乎又有些誇大其辭。在實際操作中，在完成了一個翻譯任務後，譯者就沒有必要繼續壓抑這些感情了。另外，就算這些負面的感情被壓下去了，對翻譯任務明顯缺乏熱情，目標語讀者也能感受得到。換言之，就算負面態度有可能很好地被掩飾起來，表現出看似恭敬的中立，但最終將以某種方式投射出來。的確，當譯者日後再次被迫面對類似的翻譯任務時，心存未消的餘怒可能產生難以預計的影響，在譯文裡流露或表現出來。譯者的克己，也可算是職業要求，乃至職業道德的體現。

喜惡之類的感情在某種程度上是有文化預設的。群體與個人感情之間的區別關乎某些措辭的選擇，也關乎能否弄好翻譯再現的平衡。一般來說，如果感情在原文裡是隱形的，在譯文裡似乎也不必過於顯現，但由於隱形的感情相對不容易被目標語讀者識別，至少應設法標記出它們是隱形的。可以設定一定程度的普遍主義，譬如欲望、貪婪、愉悅和憤怒等基本感情，是人類共有的，故此沒有必要刻意地去表現。但翻譯有必要建構一個語境框架來控制感情，好讓目標語讀者對不甚熟悉的感情能夠有所反應。有些特定突出的文化意象，專事在原作裡喚起感情，但在譯作裡卻遭到冷遇，甚至反感，為了防止這樣的情況發生，適當的防範措施是必要的。

思想和感情不是總能分得開，故此只是翻譯思想並不足夠。Robinson 提到“思想和感情的交換”間接地強調了翻譯感情的重要性。^⑦翻譯活動揭示了各種態度、感情和印象所起的作用。感情在翻譯裡是以主體間性的形式表達的，讓我們意識到我們的信仰、態度、想法和期待，但是我們又不可操之過急地做出文化假設。Robinson 告誡我們：

如果你對別人和別的群體的感情敏感的話，你就不會有意使用冒犯他們的語言，

或毫不在意地想當然地認定別人詞語的意義；所以為了完成好你的任務，你必須要使任務變得更加艱巨。^⑧

瞭解陌生人的感情是至關重要的，喚起目標語讀者恰當的感情也同樣重要，但要使二者一致可能頗為困難，而且常常是不可能的。譯者為究竟該怎樣去適應和表達什麼或誰的感情感到猶豫不決，是十分正常的。翻譯的挑戰莫過於此，在這些因素中間，達致某種平衡，自然不是一樁容易事。

對原語文本的漠視或敵對情緒與具體的政治、文化、抑或個人的態度聯繫在一起，感情可以幫助譯者解釋或捕捉所謂的真實意圖。翻譯感情經歷的直接影響，讓目標語讀者暴露於異質他者面前，這對閱讀充滿了細緻入微細節的文化翻譯而言，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由於情感反應是由跨文化翻譯的細節所引發的，所以情感又容易成為操縱的對象。在論及與翻譯相關的戲劇演出時，Patrick Primavesi 提醒我們細節的重要性：“如果手勢是可以翻譯的話，那翻譯本身就是位移和變化的手勢。因此，微小細節的損失決定了翻譯語言的精煉與戲劇性”。^⑨因此，我們需要用感召力的手段有效地表達感情，以增添翻譯的生氣，在跨文化的語境下重塑互動模式。

情感反應

可以說，翻譯如果在情感上能打動人，的確更能令人信服。欲做到這一點，需要譯者進行情感移情，反復強調情感移情不朽的重要性不斷提醒我們需要加深對他者的理解。情感的具體化與翻譯的效力不無關係，跨文化翻譯需要考慮的是局外身份，如果難以做到擺脫陌生感和疏離感，無疑與情感有關，而情感本身又是因文化和時間而變的。局外身份對情感是否能在跨文化條件下共同體驗提出了疑問，並可能造成文化放逐和虧損，伴隨而來的是明顯的情感距離。冷漠通常由跨文化自負引致，源於對異質他者的無知或膚淺理解。唯有刻不容緩地建立和發展跨越時空的情感默契或共鳴，才能保證翻譯在最佳狀態下運作。情感移情是克服文化冷漠的有效策略，找出一個情感的文化視角，將情感與文化合而為一，並構建某種移情局內感，這對加深跨文化理解，無疑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Keri Brand 強調：“移情不僅是用來感受他者，而是用來感覺和弄清他者的資源”。^⑩

弄清他者並不意味著喪失自我，情感移情不一定與自我意識格格不入，反過來，到可能培育和加強後者。Cormac Ó Cuilleanáin 指出：

為了譯出，有些文本需要聚焦“讀者”（如文學對話），要在譯者的心目中得以實現，如同一次視覺演出，想像中的人物對說出話語效果的回饋，尤其要包括情感效果。^⑪

意義的產生和及其效果靠的是感情和情感，情感的表現極可能是原文的最主要部分，譯者是一個表演者，沒有情感或不能調動情感，就扮演不好自己的角色，也難以與觀眾（讀者）進行有效的交流。作為表演的翻譯，通過譯者的主體得以實現，通過感情的交流獲取自己和他者的情感共用，是挑戰性極強的任務。由此可見，加大或減弱所表達的情感取決於譯者，他的決定與文化共鳴和翻譯意義有直接的關係。

對目標語讀者來說，翻譯閱讀是否得到相助大有區別。原語文本和目標語文本裡的美學材料含有不同的情感反應形式，有關美學情感的背後真相也會顯露出來。情感和情緒可以表達出來，也可被喚起，文化差異對分析和傳送辭彙、短語和句子的情感內涵的作用甚為關鍵，需加以充分的關注。翻譯的重大挑戰之一就是重新建構真實可信的情感體驗，為目標語讀者提供某種情感和

意識的形式，幫助他們增加對異質他者的情感理解和提高相關的回應能力。翻譯有必要消除或至少降低疏離感，否則會嚴重阻礙跨文化美學體驗或導致無視不同文化傳統的情感品質。不含種族中心主義的文化態度正視翻譯的情感因素，有助於產生情感融洽、親密關係和相互信任。

修辭再現

如果文學翻譯僅僅是再現原文的基本語義資訊，而全然不顧修辭的優雅，那這個翻譯便有嚴重缺陷，其結果是目標語讀者被剝奪了閱讀文本的審美樂趣，不僅如此，文本的表達功能和勸說功能也可能受損。修辭的重要性就在於喚起感情和情感的巨大功能，可以說，文學翻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原文的修辭再現是否加以足夠重視，讓讀者閱讀譯文就像閱讀原文一樣饒有興致。不容否認的是，由於文本位移使得修辭情況發生了變化，翻譯需要修辭方面的挪用，重新配置修辭方式，有效的文學翻譯便是修辭創新的結果，也就是達到 Nida 所言的功能對等的效果。

簡言之，直接的或字對字的翻譯，慣常會使原作的修辭效果歸於無效，原作原本有效的修辭機制是難以用異化的方式遷移到目標語文本的，如此一來，風格的相似度恐難以達到，但修辭卻又是不可忽略的一方面。Cicero 談到翻譯演說家 Attick 的模式時說：“我是以一個演說家的身份而非闡釋者的身份翻譯他們的”。^⑨譯者的任務是在譯文裡並置修辭模式，恢復修辭的文化功能，在翻譯中再現修辭方式。考慮到未經必要的調解和挪用的直譯並不令人滿意，譯者所面臨的挑戰就是匹配原作相應部分的修辭效果。常為人引用的 Stanley Fish 有關修辭陳述的觀點是：“一個陳述如果讀者需求，它就帶有修辭性質了”^⑩。然而，鑑於在翻譯中重建修辭是一個頗具偶然性的過程，新建的目標語修辭系統要與目標語的規範標準相吻合，於是便導致了本土化的修辭，但仍與原語文本優雅的修辭相匹配。就這個意義上講，譯本不可避免地帶有譯者態度和感情的烙印。

複譯發軔於對復蘇的訴求，有時一個充滿生機的新譯作賦予翻譯以新的生命。新生命的標誌是什麼？其中主要的一個是對他者的感情體驗變得更直接和明確，所付出的代價是表面意義。仔細觀察翻譯的內部規律，修辭的傳遞與翻譯態度相關，應在譯文裡捕捉和重建與細微感情相關的文化干預形式。根據 Lauren G. Leighton 的觀察：“兩個獨自產生的譯文可能都非常忠實原文，但彼此卻大相徑庭。”他繼而又指出：“其實，除了選詞和意象具體的巧合以外，翻譯很少相象”。^⑪需要明確指出的是，致使他們不同的要素很可能是翻譯修辭使用的不同。

修辭對文學而言至關重要，對文學翻譯而言亦是如此。一個修辭，即使是無意使用的，都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認可翻譯裡不同的文化或意識形態價值的作用，尤其是恰逢目標語文化處於對外國文化開放的狀態。感情修辭可能在大多數人那裡產生共鳴，無論其文化、社會、宗教和政治背景如何。因此，翻譯在傳遞感情修辭時，需要設法克服原語修辭的疏離感。雖然不是太地道的、不十分符合目標語規範的翻譯語言可能在目標語讀者身上產生距離效果，但目標語讀者至少有機會去體驗不同的東西，包括不同的修辭，並且是以不那麼間接的方式去體驗。翻譯常常構成對根植於目標語系統的傳統價值的挑戰，故此也需要對敏感的道德或宗教問題採用謹慎的修辭。視翻譯態度而定，翻譯其實可以就是傳遞修辭，好讓目標語讀者真實地體驗原文，並通過修辭體驗到原文的感情。當然，傳遞的方式絕非機械性的，而是通過適度的文化協商及調整。

此外，為降低不可譯的程度和提高可讀性，目標語內常見的修辭方式也會在譯文裡使用。如 Heike Bauer 所說：“一個文本在翻譯中的改動在更適合譯者的文化語境的同時，也變得可譯了”。

^⑨ 通過改動和改造過的審美訴求，使異質他者適合目標語文化的特有需求，這就決定了翻譯的結

(效)果。翻譯修辭是一個很有效的傳遞涉及同情感的手段，譯者需要在字裡行間裡捕捉原語文本裡隱藏的細微差異，喜怒哀樂，五味雜陳，各種難以言說的情緒都應包括在內。Joyce Davidson等人曾指出：“無論再現情感的嘗試有何種問題，藝術形式……經常尋求重現和喚起情感，這樣的重現為情感的文化構建提供了有用的洞見”。^⑨從某種意義上說，修辭傳遞其實也是心理傳遞，翻譯涉及兩組修辭的語言和文化的相互作用，探討和平衡兩組修辭不僅能有效地避免文化張力，還可促使更有效的跨文化交際。

結 語

思想和感情難以徹底分割開來，但如果後者在譯文裡沒得到準確和充分的再現，前者難免受到負面的影響，交際效果亦會降低。通過文化干預來控制或操縱翻譯，譯者的主體性在各種策略中得以體現和突顯。賦予文本情感複雜模式的細節發生虧損和位移，容易造成譯文的情感重現出現偏差或扭曲。常見的現像是，扭曲的翻譯並不見得發生在語義的層面上，而是發生在與翻譯相關成問題的態度或感情方面，結果給翻譯閱讀帶來不期然的負面影響。不讓原作者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感情投射到譯作裡，等於變相改變認知重現，好似譯者把自己的態度或感情強加到譯文上。如果原語文本的語言充滿了原作者的體驗和感情，目標語的語言就沒理由顯得乾癟和毫無生氣，豐富的語言質地需要在譯文裡得以複製。盡可能保持中立就意味著最小限度的干預，但卻又不符合實際，缺少移情又將導致原作豐富複雜的態度和感情複製的失真。

翻譯實踐與其跨文化語境緊密相連，就原作者的態度、感情、判斷和承擔而言，譯者有各種風格和話語的選擇。把意義從一個語言傳送到另一個語言，構成了翻譯基本資訊的基礎層面，但這僅僅是認知的再現。人們更多地覺得，如不能以一個更為互動的跨文化交際模式來從事翻譯，是不恰當和欠缺敏感的。一方面，漠不關心或任何不情願干預的情況很可能阻礙翻譯的運作。另一方面，由於翻譯的結果是不確定的，幾乎就是視譯者的態度和操作（縱）方式而定，其重寫行為反應了並受制於與目標語系統息息相關的態度或感情。文化或政治的限制是重寫過程的一部分，儘管或因為譯者的主體性，其在翻譯中的核心作用日益受到重視，原作的情感和感情幾乎是和基本語義資訊同步傳送的。因此，不管譯者是否刻意與原語文本保持距離，我們可以說，翻譯實踐近乎等同於文化調解和干預。

① Wechsler, R., *Performing without a Stage: The Art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North Haven: Catbird Press, 1998, p. 72.

② Simon, S., *Gender in Transl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66.

③ Sharma, K.K., *Rabindranath Tagore's Aesthetics*, New Delhi: Abhinav Publications, 1988, p. 34.

④ Kothari, Rita, *The Translation of Dalit Literature into English*, In Munday, Jeremy. (ed), *Translation as Intervention*,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7, p. 45.

⑤ Butler, C., *Interpretation, Deconstruction, and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Some Current Issues in Literary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 1.

⑥ Robinson, D., *Becoming a Translat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26.

⑦ Ibid, p. 62.

⑧ Ibid, p. 193.

⑨ Primavesi, P., “The Performance of Translation: Benjamin and Brecht on the Loss of Small Details”, *TDR*, Vol. 43, No. 4, p. 58.

- ⑩ Brand, K., Intelligent Bodies: Embodied Subjectivity human-horse Communication, In: Waskul, Dennis D. & Vannin, Phillip (eds), *Body/Embodiment: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6, p. 145.
- ⑪ Cuilleanáin, C. Ó., Channelling Emotions, Eliciting Responses: Translation as Performance, In: Sheilds, K. & Clarke, M. (eds), *Translating Emotion: Studies in Transformation and Renewal between Languages*, Bern: Peter Lang, p. 70.
- ⑫ 轉引自 Copeland, R., *Rhetoric, Hermeneutics, and Transl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Academic Traditions and Vernacular Tex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
- ⑬ Fish, S., *Self-Consuming Artifac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 1.
- ⑭ Leighton, L.G., Translation and Plagiarism: Puskin and D. M. Thomas, *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Vol. 38, No. 1, 1994, p. 70.
- ⑮ Bauer, H., Not a translation but a mutilation: The Limits of Translation and the Discipline of Sexology, *The 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 Vol. 16, No. 2, 2003, p. 384.
- ⑯ Davidson, J. et al., "Introduction", *Emotional Geographies*, Davidson, J., Bondi, L. & Smith, M. (eds.),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2005, p. 11.

參考文獻

- [1] 《試論情感在翻譯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上海：《上海科技翻譯》，第1卷，1995年，第9～11頁。
- [2] Richter, F. (ed.), *The Dragon Millennium: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Coming World Economy*, Westport, CT: Quorum Books, 2000.
- [3] Rosengrant, J., Nabokov, Onegin, and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The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Vol. 38, No. 1, 1994, pp. 13-27.
- [4] Simon, S., Translating and Interlingual Creation in the Contact Zone: Border Writing in Quebec, In Bassnett, S. & Trivedi, H.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58-74.
- [5]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作者簡介：孫藝風，香港嶺南大學翻譯系教授，博士。

[責任編輯 陳志雄]